

儒家治国方略

曹德本 著



儒家治国方略

曹德本 著

儒家治国方略

曹德本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子贵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7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01-1597-7/D·287 定价：(平)3.85 元

(精)5.85 元

目 录

导 论	1
一、儒家治国方略的宏观架构	1
二、儒家治国方略的主体性质	3
三、儒家治国方略的国情氛围	5
四、儒家治国方略的现实品格	6
第一章 儒家治国方略的哲学论证	14
一、天命观	14
二、天道观	18
三、天理观	24
第二章 儒家治国方略的伦理准则	28
一、人性观	28
二、修养观	70
三、境界观	101

第三章 儒家治国方略的基本观点	114
一、仁政观	114
二、民本观	134
三、君臣观	153
四、义利观	164
第四章 儒家治国方略的兼容精神	180
一、法家与儒家治国方略	181
二、道家与儒家治国方略	186
三、道教与儒家治国方略	191
四、佛教与儒家治国方略	196
第五章 儒家治国方略的价值取向	204
一、儒家治国方略的影响所及	204
二、儒家治国方略的生命活力	208
三、儒家治国方略的滞后因素	210
结 语	212
一、儒家治国方略的总体评价	212
二、儒家治国方略的现代展望	214

导 论

一、儒家治国方略的宏观架构

儒家治国方略是指儒家在治国主张方面的方案和策略，是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决策，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孤立的政治措施，而是儒家通过融会各家思想所形成的基本的治国指导方针，是在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从它的宏观架构来看，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

在哲学思想中，儒家提出了天命观、天道观、天理观，对宇宙的本体作了精微的探究，儒家并不是孤立地阐述宇宙本体论，而是把宇宙本体与社会人事密切联系起来，讲天命同时也讲人命，讲天道同时也讲人道，讲天理同时也讲人理，讲天命、天道、天理是为人间立定秩序。董仲舒讲：“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二程讲：“圣人奉天理物之

道”(《文集》卷一),朱熹讲:“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朱子大全·延和奏札》),陆九渊讲:“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从事”(《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王阳明讲:“圣人所以为圣,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传习录》上)。儒家从哲学的高度构筑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贯穿于儒家治国方略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在期间,有的以天上的神权为地上的封建王权进行论证,有的主张人道不违背天道,人理不违背天理,来论证天下国家的治理,尽管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以哲学思想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

在伦理思想中,在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重点阐发了修身治国之道。例如,孔子讲:“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中庸》讲:“子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孟子讲:“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大学》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运》讲:“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儒家构筑了人性观、修养观、境界观一整套伦理思想,主张人性禀于天性,宗旨在阐发先天所禀的人性之善恶,必须靠后天的修养,扬善去恶,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为儒家治国方略确立了伦理准则。

在政治思想中,在以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伦理思想作为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一整套治国基本观点,诸如仁政观、民本观、君臣观、义利观等等,从而构成了儒家治国的完备思想体系,它兼容各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适应时代的变革而与时俱进。它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汉代处于独尊的地位,经过隋唐时期的儒释道融汇和冲击,到了宋代,随

着封建制的巩固而臻于完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总之，儒家治国方略是根据《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设计蓝图，系统地阐述了“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序》），这种宏观架构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宗旨，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最后归结为封建社会的治国平天下。无论是从立论的高度，还是触及的深度，以及涉及的广度，都可以看出，儒家治国方略是一套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二、儒家治国方略的主体性质

所谓儒家治国方略的主体性质，是指在整个传统思想中，在与外来思想的融合、冲击中，儒家治国方略居于主导地位，它得到封建社会的尊崇，贯穿于封建社会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为民族承受力所认同，这些诸多因素，使儒家治国方略形成了民族意识的主体性。具体地讲，这种主体性的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所处地位来看，儒家治国方略处于正统的地位。在春秋战国时代，从孔孟到荀子，标志着儒家治国方略的形成，到了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使儒家治国方略应用于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经过隋唐漫长的历史时期，儒家治国方略与佛、道几经冲击、融合，并援引法家思想而逐步发展，到了宋代，发展为程朱理学，使儒家治国方略成为完善阶段的封建社会的官

方哲学，以后，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治国方略一直处于正统地位。

2、从各种思想分析来看，在与各种思想的相互冲击和融会中，儒家治国方略居于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出现了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流派，汉代以后，“儒道传而墨法废”（《论衡·案书篇》），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兼采法家，援引道家，兼容佛教和道教，出现了冲击、融合的局面。儒家治国方略在这种冲击融合中，采各家之所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主导地位不但没有丧失，反而更加充满生机。

3、从思想发展历史来看，儒家治国方略贯穿于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儒家治国方略是适应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思想意识，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始终服从这一宗旨不移，无论是封建帝王的更替，朝代的变迁，儒家治国方略只从应用于封建社会的现实以后，尽管思想发展呈现曲折性，但它贯穿于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思想所不能比拟的。

4、从民族接受程度来看，儒家治国方略的基本精神已深入人心，为中国封建社会各民族所认同。在儒家治国方略中，有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有滞后的消极因素，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历史积淀，成为民族精神的凝结，它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之中，正因为“儒之道义可为”（《论衡·案书篇》），才具有如此广泛的民族接受程度。

总之，儒家治国方略以其庞大的思想体系，经得起外来思想的冲击，并与各家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了不失主体性的思想意识，它具有广泛的民族接受程度，在封建社会中基本上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具备了儒家治国方略的主体性质。

三、儒家治国方略的国情氛围

儒家治国方略作为具有民族意识主体性的思想主张，它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上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国情氛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经济基础来看，决定于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文明古国，这种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国家关于政治、经济的决策离不开土地问题，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民的最大愿望是求得在一块土地上世代辛勤耕耘，求得温饱，安居乐业。历史上，商所以亡，其主要在于君主不问农耕，不问民间疾苦，战国群雄争霸，凡重视“耕战之术”，体察民情，则称王称霸，七雄之一的秦国因重耕战，最终征服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儒家制定治国方略所必须认真考虑的现实。

2、从社会制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以家长制为管理方式，家族制是社会制度的基层单位，从家到国构成了社会的机体，从秦代开始直至清朝，形成和确立了沿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的特点是多民族的统一体，民族凝聚力显得尤为突出，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儒家治国方略既适应了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也适应了多民族统一的需要。

3、从文化背景来看，基本上是封闭状态下的思想继承。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处于封闭状态，其间时有文化交往，但没有发生明显的异化，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当初也靠儒家思想才得以扎根，后来逐步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出现了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兼容。在没有较大的文化冲击的状态下，儒家思想得以缓慢平静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靠各种思想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靠儒家思想自身的传承，即以解经、注经和师承的方式代代相传，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思想继承，保存了儒家风格、特征得以沿续，它构成了儒家治国方略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

总之，儒家治国方略根植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孕育滋长，具有中国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构成了儒家治国方略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国情氛围。

四、儒家治国方略的现实品格

儒家治国方略的现实品格是指治国主张与实行的统一。一种思想主张是否具有现实品格，一方面取决于现实社会对这种思想主张的需要和运用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这种思想主张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程度，儒家治国方略在思想主张与实行的统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特点，从而具有现实品格。

第一、封建帝王以儒治国，治国主张因时制宜。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进入汉代以后，基本上尊崇儒家治国方略，朝代更迭，以儒治国的宗旨不易，而且随着时代的变革，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儒家治国方略也因时制宜，随时代

发展而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时期，一方面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儒家作为一家之言开始形成，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提出了德治主张；其后，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典籍有，《中庸》、孟子、《大学》、荀子等，都提出和论述了儒家治国的基本思想，荀子作为儒家治国方略形成的标志，他适应时代的需要，从社会现实出发，系统地阐述了礼治、仁政、富国、足民、君臣之道、义利之辨等一系列思想主张，为儒家治国方略运用于封建社会做好了思想准备。

在秦朝时期，是中国封建制确立的时期，秦运用法家“耕战”思想灭六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以法治统一天下，在这方面，法家思想主张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以儒治国平天下的主张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就十五载而亡。尽管如此，在秦代也有法儒统一的倾向，儒家治国方略开始受到封建君主的重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刻石中讲：“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不踰次行。”讲述了儒家所主张的仁义之政和道德纲常；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石中讲：“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也讲到了儒家的宽民之政。这些都说明，在秦代，虽然没有实行以儒治国的方针，但也开始注意到法儒统一的问题，后世儒家总结秦亡的教训，重新倡导儒术，开始步入以儒治国的轨道。

在汉朝初期，为吸取秦朝由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新书·过秦中》）导至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在一个由战乱到平治的转换时期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运用黄老思想，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揉和儒法而刑德并举，汉高祖刘邦任用法治，“肖何摭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

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另一方面命“陆贾造《新语》”（《汉书·高帝纪下》），文帝“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史记·孝文本纪》），景帝下诏“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汉书·景帝纪》），从汉高祖到文景之治，基本上采取黄老思想并辅以儒家德治，这时，儒家治国方略虽然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但已开始注意到以儒治国的问题。在期间，应该指出的是，陆贾是一个向儒家治国转换的关键人物，他总结秦亡的教训，提出以儒治国的主张，他以儒为主，融会道家，提出“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新语·道基》）。陆贾是促进汉代重儒的关键人物，开启了以儒治国的先声。

在两汉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繁荣，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社会格局，思想文化的统一也提到日程上来，以儒治国平天下便成了当务之急，只有儒家治国方略才能起到这个作用。这时，儒学以经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出现了研究、注释儒家经典的汉代经学，官方的提倡促进了儒家经典的权威；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是三种研究经学的形式，这时的经学已成为官学，当时置《书》、《诗》、《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并有儒者进入仕途参与政治，从而为实施儒家治国方略铺平了道路。董仲舒从现实需要出发，以儒为主，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作《春秋繁露》，将儒学神学化，以天上的神权为地上的封建王权作论证，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使儒家治国方略居于统治地位，这是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需要。东汉初，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班固等编撰《白虎通义》，宣扬“三纲六纪”的神秘性，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结合更为密切，使谶纬成为钦定法典，经学走向神秘化。

在魏晋时期，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社会的动荡，三国鼎

立，群雄争霸，打乱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另外，还由于汉代经学的繁琐性和谶纬的神秘性，儒学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经过黄巾起义的冲击和王充等人的批判，不能作为正统思想存在下去。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学术上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儒学走向玄学化，出现了魏晋玄学，这是魏晋门阀士族一方面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追求绝对自由、精神空虚的理论上的表现。这一时期，代表人物如：王弼“好论儒道”（《三国志》卷二十八），郭象会通儒道，“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何晏、王弼以“贵无”说论证了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的思想主张，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裴頠的《崇有论》力图维护名教，向秀、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都带有儒道合一的倾向，试图在任自然与崇名教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治国方略。在这一历史时期，是儒家治国方略随着社会的动荡而出现曲折的时期。

在唐朝时期，这是儒家治国方略与佛道融合并开始复兴的时期。武德年间，京都立国子监，以儒家经典作为入仕必读经书，贞观初，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命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唐太宗对儒、释、道报着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尤重儒学，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韩愈在振兴儒学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道统说将自己说成是孔孟的正统传人，重点论述“性三品”说和“治心”、“治世”等思想主张。尽管如此，在唐朝时期，儒家治国方略仅处于与佛道融合的时期，并开始出现复兴的趋势。

在宋明时期，这一时期是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处于完善阶段

并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新儒家融会儒释道，建立了更为精深的宋明理学，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儒家治国方略又开始居于统治地位。在这一时期，封建君主重儒治国，如宋太祖赵匡胤讲：“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并“大重儒者”（《宋史·太祖纪》），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初，令李昉等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宋真宗赵恒“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宋史·真宗纪》），宋仁宗赵祯曾到国子监参谒孔子（见《宋史·仁宗纪》）。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身居显位、把儒家治国方略推行于政事的政治家，如北宋的司马光、王安石和明代的张居正等人，也出现了著名的理学思想家，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在宋代，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时代在发展，社会矛盾的突出，儒家内部有识之士针对时弊和性命义理的空谈，提出了功利之学的思想主张，这种主张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是儒家治国方略与时俱新的理论表现。

在明清之际，这一时期主要是指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这一时期，是儒家治国方略走向衰微、面对现实寻求新的途径的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封建统治者以儒治国的宗旨不变，但在儒学进步思想家那里却表现出时代的觉醒。这一时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状况摆在面前，一是中央集权专制进入衰落时期，二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三是西学开始对中学的冲击。与这种社会现实状况相适应，思想上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实学思潮，二是反君主专制思潮，这两股思潮都是儒学内部发展变化的产物，是明清之际儒学中进步思想家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提出的思想主张。

关于实学思潮。实学思潮是明清之际社会发展的产物。明

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作为新的生产关系必然在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另外，宋明理学的空疏衰落的风气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引起震荡。这一时期，儒学中一些进步思想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相继提出了自己的实学主张。“实学”思想源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因素，程颐提出过“治经，实学也”（《遗书》卷第一）的概念，但作为一种思潮，则出现于明清之际，这时，有人把经世致用称为“实学”，如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主张“学问必须躬行实践”（《高子遗书》卷五），“随时为吾民，此士大夫之实事也”（《高子遗书》卷八）。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必然有它的总体特征，实学思潮是儒学在明清之际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以经世致用为总体特征的学术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思想主张，是儒学与时俱新的表现形态。实学思潮具有启蒙性质，对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化的转换开启了先河。这一时期，出现了像罗钦顺、王廷相、黄宗羲、王夫之、颜元、顾炎武等别开生面的进步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儒学大师，也有代表市民阶层的思想家。从总体上讲，实学思潮是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维护封建制度前提下的思想主张。

关于反君主专制思潮。与实学思潮相联系，在这一时期，一些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限制君权的思想主张，如黄宗羲提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提出“分治”的主张；顾炎武提出“分权”、“众治”的主张。这是儒学中进步思想家适应时代的发展，针对君主专制的积弊而提出的思想主张，是儒家治国方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总之，在明清之际，无论是实学思潮，还是反君主专制思潮，都停留在思想界的觉悟阶段，只是一种时代的呼声而已，并

没有居于统治地位,但这两股思潮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开启后世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儒家学者积极入世,思想主张注重践履。

儒学治国方略的现实品格还取决于思想本身为现实服务的程度,在这方面,更多地体现于儒家学者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以及思想主张本身注重践履的内在机制。

关于儒家学者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这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一贯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把修身治国平天下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己任,臣对君、子对父、民众对国家都负有责任,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参与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忧患意识。孔子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秦伯》)“尚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孟子讲:“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讲:“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张载讲:“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二程讲:“穷经以致用”(《遗书》卷第四)朱熹讲:“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叶适讲:“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集·赠薛子长》)顾炎武讲:“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周易》中讲到了忧患意识,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